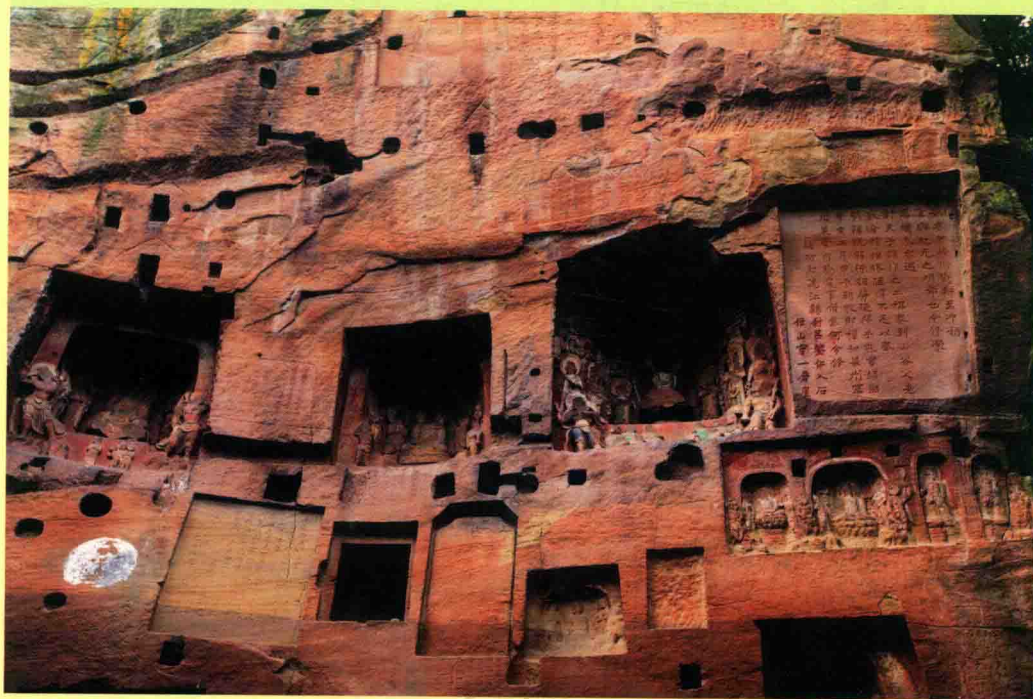


嘉陵江流域

石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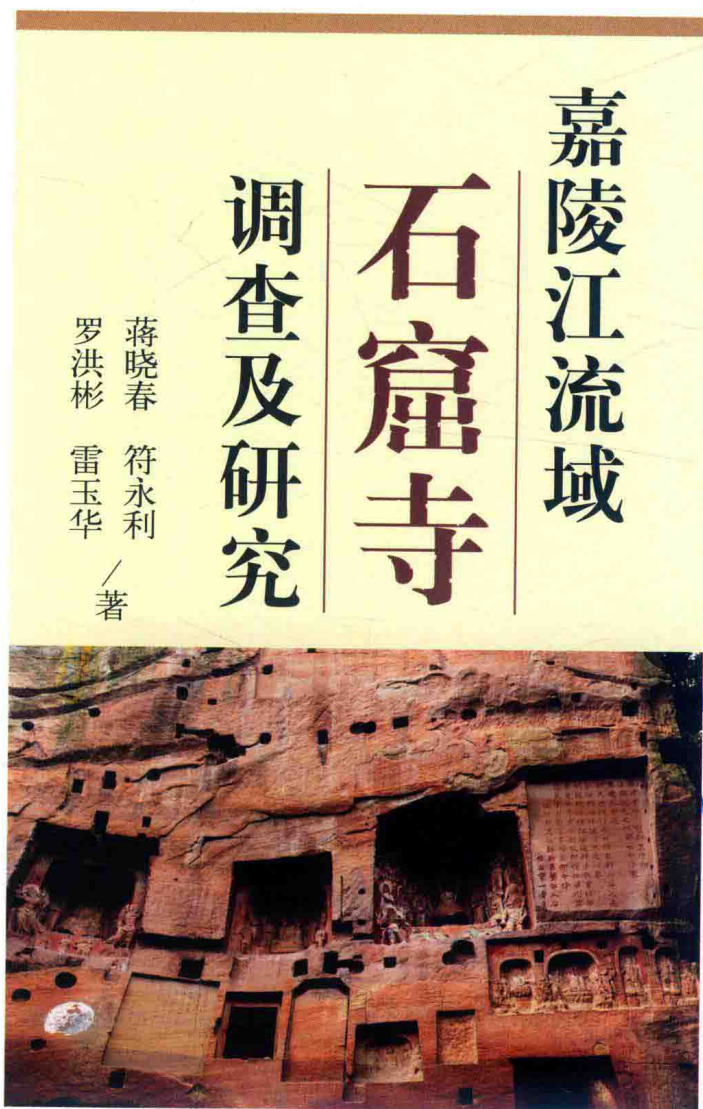
调查及研究

蒋晓春 符永利
罗洪彬 雷玉华
/ 著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研究”(11XKG003)的结项成果；
获得“西华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石窟寺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支艳丽的奇葩。近些年来,中国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地域覆盖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宽广。在此背景下,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本书搜集整理了嘉陵江流域 1702 处石窟寺资料,并对调查过的 10 余处重要石窟点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社会背景、观音造像以及与其他地区石窟寺的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方向的研究者参阅。

审图号: GS (2018) 141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调查及研究/蒋晓春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03-055489-5

I. ①嘉…II. ①蒋…III. ①嘉陵江-流域-石窟-研究 IV. ①K879.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2058号

责任编辑: 范鹏伟 / 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张克忠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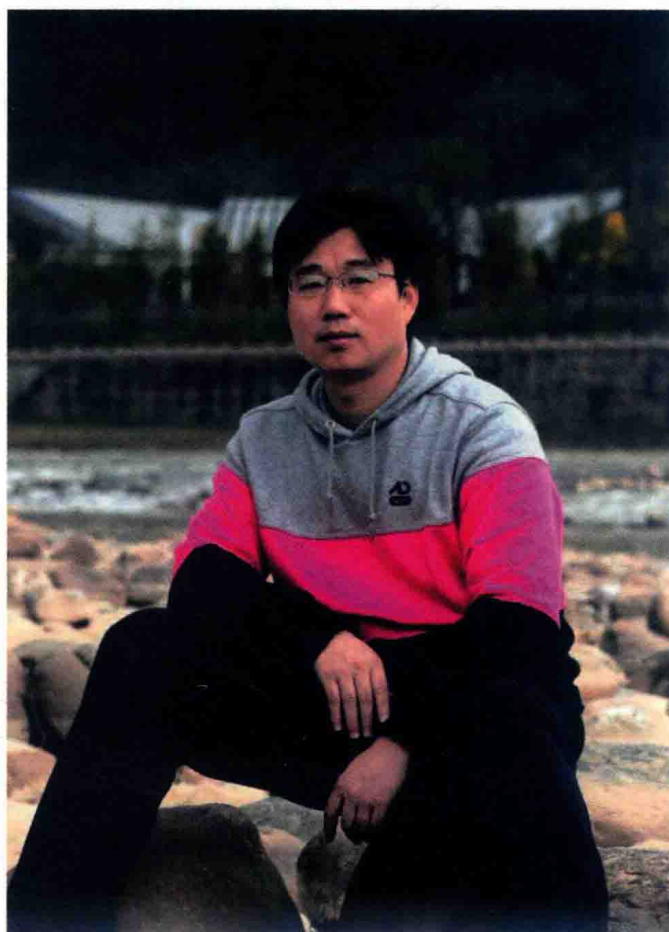
2018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1/4 插页: 70

字数: 801 000

定价: 26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蒋晓春（1974—），男，四川华蓥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西华师范大学考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主要从事巴蜀考古研究。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研究”），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获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1次。



绪论.....	1
第一章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概况	16
第一节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数量及分布	16
第二节 重要石窟寺简介	22
第二章 四川广安冲相寺石窟	37
第一节 龛窟介绍	38
第二节 分期、断代	68
第三节 冲相寺定光佛造像考证	75
第四节 冲相寺石窟中的太阳纹头光	88
第三章 四川营山太蓬山石窟	96
第一节 龛窟介绍	98
第二节 分期、断代	124
第四章 四川阆中大像山石窟	134
第一节 龛窟介绍	135
第二节 分期、断代	148

第五章 重庆合川龙多山石窟.....	157
第一节 龕窟介绍.....	158
第二节 分期、断代.....	188
第三节 田湾3号龕探讨.....	205
第六章 重庆合川钓鱼城石窟.....	213
第一节 龕窟介绍.....	213
第二节 分期、断代.....	230
第三节 部分问题探讨.....	238
第七章 其他中小型石窟群.....	245
第一节 四川阆中石室观石窟.....	245
第二节 四川阆中千佛岩石窟.....	261
第三节 四川阆中雷神洞石窟.....	271
第四节 四川阆中佛子岩石窟.....	275
第五节 四川南充青居山石窟.....	278
第六节 四川南充万山寺石窟.....	284
第八章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	292
第一节 分期方法讨论.....	292
第二节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	295
第三节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阶段性演变的社会背景.....	322
第九章 嘉陵江流域的观音造像.....	325
第一节 嘉陵江流域观音造像概况及分期.....	325
第二节 观音造像组合.....	345
第十章 嘉陵江流域与周边地区石窟寺的关系.....	354
第一节 6世纪初至6世纪下半叶.....	354
第二节 6世纪末至7世纪上半叶.....	358

第三节	7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中叶	362
第四节	8 世纪下半叶至 9 世纪末	370
第五节	9 世纪末至 13 世纪上半叶	380
结语		384
后记		386
附表		389
附表一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一览表	389
附表二	嘉陵江流域纪年石窟一览表	423
附表三	嘉陵江流域观音造像一览表（广元、巴中、绵阳、安岳、大足）	438

绪 论

一、嘉陵江流域地理

嘉陵江是长江最大的一级支流之一，在不同时期、不同区段曾有潜水、西汉水、閬水、涪江、渝水等名称。关于嘉陵江的源头，学术界尚有争议^①。一般认为嘉陵江分东、西两源，东源起自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凉水泉沟，西源起自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齐寿乡的齐寿山，两源南流至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白水江镇相会，再南流经阳平关进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与上游最大支流——白龙江汇流，向南流经苍溪县、阆中市、南部县、蓬安县、南充市（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武胜县而达合川，在合川左纳渠江、右汇涪江两大支流后，经北碚区到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 1119 千米（以陕西凤县故道水为源头计）^②。嘉陵江在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以上为上游，行经高山地区，多暴雨，有“一雨成灾”之说；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至重庆市合川区为中游，境内多低山丘陵，江流百折千回，水流平缓，有航运之利；合川以下为下游段，行经低山丘陵地区，穿行低山时形成数个峡谷。

嘉陵江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在 500 平方千米以上的一级支流多达 17 条，包括白龙江、西汉水、涪江、渠江、东河（宋江）等，这些支流在嘉陵江流域呈“Y”形分布。古人多顺河而行，所以干流和各支流同时也是古代巴蜀和陕西、甘肃的交通要道和文化交流要道。

本书所论之“嘉陵江流域”是指嘉陵江干流及其支流流经的区域。全流域面积 15.98 万平方千米，包括甘肃省天水、陇南、甘南 3 个市（州）的 11 个区县，陕西省汉中、宝鸡市的 3 个县，四川省广元、绵阳、遂宁、南充、广安、达州、巴中的全部以及阿坝、德阳、资阳的局部，共 10 市（州）48 个县（市、区），重庆市境内大足、潼南、铜梁、合川、北碚等 10 个区。

嘉陵江流域东北部以秦岭与渭水流域相界、以大巴山与汉水流域为邻，东南以华蓥山与长江流

① 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单源说，又分三种，分别为陕西凤县说（即故道水说，认为嘉陵江源头为陕西凤县境内的故道水，故道水与西汉水在略阳汇合后称嘉陵江。这种观点较为流行）、甘肃天水说（即西汉水说，认为嘉陵江发源于甘肃天水齐寿乡齐寿山，即古文献中的蟠冢山）和甘肃碌曲说（即白龙江说，认为嘉陵江发源于岷山北麓碌曲县与若尔盖县边境的郎木寺）。二是双源说，认为嘉陵江源头分东、西两源，东源在陕西凤县，西源在甘肃天水。三是三源说，即东源在陕西凤县，中源在甘肃天水，西源在甘肃碌曲。可参见常崇信《嘉陵江河源考》（《宝鸡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和李铁松、张桥英《嘉陵江的起源及流域自然环境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等论著。

② 也有其他说法，如 1280 千米说（易瑜、易哲文：《嘉陵江源流在何处》，《人民长江》2001 年第 4 期）、1345 千米说（新华网：《中国科学家重新确定嘉陵江源头》，<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0126/c1057-24233671.html>，2014 年 1 月 26 日）等。

域相隔,西北有龙门山与岷江流域接壤,西及西南有一低矮的分水岭与沱江流域毗连。

整个嘉陵江流域在地形上由北向南可分三大阶梯形区域。广元以北为第一级阶梯,这里多为岷山、秦岭及大巴山区,山大地少,峡谷幽深。德阳、绵阳以东至达州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为第二级阶梯,属低山丘陵区,小山、丘陵绵延起伏,河谷较窄,阶地较少。其南为第三级阶梯,属于浅丘地区,处于四川盆地的腹地,河谷较宽,阶地发育,河流呈现“九曲回肠”之态,形成大量台地,台地往往成为聚落的集中分布区。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易发洪水。

嘉陵江流域多数属于山地和丘陵,泥质砂岩分布广泛,颗粒较细,软硬适中,便于雕凿,为石窟寺开凿提供了地形和材料的便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个别县市分属嘉陵江流域和其他流域,但在流域分界线两侧附近的石窟寺面貌并未因此而截然不同。因此,出于资料搜集和研究的方便,我们一般也将该县市靠近嘉陵江流域的重要石窟寺酌情纳入研究范围。

二、嘉陵江流域简史

嘉陵江流域地域广大,地理条件多样,适合人类生存,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根据考古发现,嘉陵江流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在此生活。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重庆铜梁发现了一个埋藏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被学术界命名为“铜梁文化”。另据报载,重庆市文物考古所2003年在重庆合川发现了时代更早的(约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①。

嘉陵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六七千年前。目前已在干流及各大支流两岸发现了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西汉水流域的工作较细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调查发现仰韶时代遗址61处,龙山时代遗址51处^②。另外,较知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甘肃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广元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通江擂鼓寨遗址和巴中月亮岩遗址等早期人类遗址^③。近些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渝西嘉陵江流域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④。

中原的夏商时期,嘉陵江流域属于《禹贡》九州之梁州,此时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三星堆文化。西周时,西汉水流域为秦人所居,是秦人的发祥地。白龙江流域则有郿和苴等方国^⑤,考古学文化主要属十二桥文化。春秋至战国中期,嘉陵江流域北部属秦国,西部属蜀国,大部分地区属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嘉陵江流域全境为秦所有,秦分设陇西郡、蜀郡、巴郡、

① 黄骞:《合川发现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 <http://www.cctv.com/news/entertainment/20031114/101933.shtml>, 2003年11月14日。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③ 蒋晓春、白九江、赵炳清:《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④ 白九江、邹后曦:《渝西地区先秦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⑤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汉中郡进行郡县制管辖,促进了嘉陵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此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属晚期巴蜀文化。

西汉初实行封国与郡县并行制,汉武帝时期建立刺史制度,在全国设置十三个刺史,各负责一个地区的若干属国郡县,进而形成了刺史部或“州”的概念,嘉陵江流域即属其中的凉州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下设陇西郡、西县、羌道(今甘肃舟曲地区)、氐道(今甘南地区)等行政机构。益州刺史部下辖武都郡、广汉郡、巴郡,下有武都、上禄、平乐、修成、白水和葭萌等县。涪水(今涪江)流域内的刚氏(今四川平武)、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涪县(今四川绵阳北)、梓潼(今四川梓潼)、广汉等县属于广汉郡。嘉陵江干流中下游地区、渠江流域属于巴郡管辖,下辖阆中、充国、安汉、宕渠、垫江等县。秦汉时期,嘉陵江流域经济文化得到明显发展,早在西汉中期,大多数地区就渐次融入到了汉文化大家庭之中。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嘉陵江流域历经蜀汉、曹魏、西晋、成汉、前秦、东晋、刘宋、南齐、萧梁、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割据与反割据的战争频繁爆发,以致政局动荡、士庶流亡,经济文化一片凋敝。行政区划方面,由于世家大族裹挟人口大量流徙,又有僚人的大举入蜀,行政区划变化极大,出现了不少侨州侨县。但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衰退,宗教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东汉中期,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大邑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又称正一盟威之道)。随后五斗米道在整个嘉陵江流域发展十分迅速,川北、汉中一带尤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五斗米道的中心区域。道教的大发展是这里成为中国道教石窟造像重要地区的主要原因。

唐初分天下为十道,道初期为监察机构,后演变为地方行政机构,至开元年间更为十五道。嘉陵江流域上流源头(今甘南地区)属陇右道,剑阁以南属剑南道、嘉陵江以东属山南道。道以下设州县管辖,如武州(今甘肃徽县)、利州(今四川广元)、果州(今四川南充)、合州(今重庆合川)等。唐末以道领州的制度逐渐衰落,开始以节度使分区辖州,地方军镇割据。

隋唐时期,统治者均十分看重嘉陵江流域一带的重要战略地位,派出多位亲王、重臣加以镇守。唐代前期,嘉陵江流域比较安定,没有大的动乱。“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仓皇奔逃入蜀,唐末僖宗亦入蜀避乱。“两宗入蜀”事件显示了蜀地的军事重要性,亦彰显了该地物阜民丰的事实。“两宗入蜀”的直接影响是中原各类人才蜂拥入蜀,其中就有不少宗教界人士和艺术家。从一些文献可看出这些人士促进了巴蜀地区宗教信仰的发展、寺庙的修建和石窟寺的开凿。隋唐时期嘉陵江流域战略地位上升,交通方便、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僧道云集,是我国当时佛教和道教都比较兴盛的一个地区,这种背景造就了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开凿的第一个高峰期。

五代时期,嘉陵江流域大多属于前、后蜀政权,社会较稳定,经济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繁荣,宗教和宗教艺术也较兴盛。北宋时期,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的办法,分为路、州(府、军、监)、县(监)三级,嘉陵江流域大多属利州路管辖,部分属成都府路(益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宋代的大部分时间嘉陵江流域政治局势稳定,南部较北部更为稳定,人口增殖,经济文化发达。五代、两宋时期,其他各地的宗教大多衰落,而包括嘉陵江流域在内的巴蜀地区,佛教、道教却呈现一派繁荣局面,密教在嘉陵江流域也大为流行,石窟寺造像方面形成了嘉陵江流域第二个高峰期。这种繁荣局面直至南宋后期因宋金、宋蒙(元)战争而告终。

宋金、宋蒙(元)战争不仅造成了嘉陵江流域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了绵

延已久的文化血脉。这种全面凋敝的局面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然而好景不长，明末嘉陵江流域再次陷入战乱之中。鄢蓝起义、李自成起义、张献忠入川、摇黄暴乱、李蓝起义等各种动荡此起彼伏。至清初，嘉陵江流域已是满目疮痍，榛莽遍地，虎狼成群，人烟稀少。清政府不得已实施了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运动，流域内人口数量大增，原本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开发，嘉陵江流域水陆交通逐渐恢复并得到拓展。至清中叶，嘉陵江流域重又回归繁荣并基本平稳地发展至今。

从嘉陵江流域的历史看，该区域与中国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调查工作

把嘉陵江流域石窟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调查报告和论著尚未出现，但对流域内部分地区、地点石窟寺进行的调查和研究的论著非常多。现按地域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甘肃、陕西境内

嘉陵江流域甘肃境内石窟寺主要在陇南市的西和、成县和徽县境内。该区域石窟规模小，分布零星，在石窟寺资源大省——甘肃省内很不显眼，因而长期未能纳入学术界视野。2005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小石窟调查组对其中的法镜寺石窟、广佛寺石窟和佛爷台石窟进行了详细调查，发表了《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①。其中西和县八峰崖石窟名气稍大，当地文物部门曾作过调查，也为《中国石窟图文志》等一些文物古迹、旅游方面的介绍性材料收录，但记载十分简略^②。孙晓峰和王百岁两位学者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详细调查，并撰写了《八峰崖石窟散记》^③和《八峰崖石窟内容总录》^④两篇文章。前者兼顾了通俗性和科学性，是对八峰崖石窟第一次全面的介绍和初步研究。王百岁对石窟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由于是总录性质，未加研究，遗憾的是图文太少，以致难以依据该文进行深入探讨。两文皆提到了杜甫的《石龕》诗，认为既然杜甫已经看到石龕，则该处石窟的年代当在宋代以前。刘雁翔的《杜甫〈石龕〉诗与八峰崖石窟》一文认为杜甫所见石龕就是八峰崖石窟^⑤。

陕西境内的嘉陵江流域范围不大，石窟寺数量也很少，除地方文物部门作过一些调查并将其情况载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等材料外，未见专门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⑥。

（二）四川、重庆境内

四川省和重庆市在历史上原属一体，行政上的分离不过二十年左右，故本书亦将之作为一体论述。

① 孙晓峰：《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王百岁：《陇南八峰崖石窟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③ 孙晓峰：《八峰崖石窟散记》，《丝绸之路》2000年第5期。

④ 王百岁：《陇南八峰崖石窟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⑤ 刘雁翔：《杜甫〈石龕〉诗与八峰崖石窟》，《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1期。

⑥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

境内嘉陵江流域石窟寺数量巨大,延续时间长,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工作起步较早。南宋以来就有文人注意到嘉陵江流域石窟造像,并将其记入一些诗文和方志中。南宋祝穆《方輿胜览》中记载:“乌奴山……峭壁如削,有洞高不可上。”^①其中的乌奴山即皇泽寺所在山峰,从皇泽寺石窟现状看,部分石窟高悬崖壁,与洞无异,很有可能就是祝穆所记的“洞”。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纪胜》记载了部分碑刻材料,如其“神室观”条记录了阆中石室观石窟的一方题刻:“在阆中十余里大龙山下,宋明初天水魏静筑道堂以居之,岁久,静去。南齐太守譙灵超览其遗迹,题曰:喧途易遣,真境难寻,愔愔魏生,迥然绝尘。刊于石壁。”^②

明清时期的典籍,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文献中关于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记载更多,以明代杨慎《全蜀艺文志》、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最为突出。例如《全蜀艺文志·巴州碑记》中就有《唐古佛龕石刻》和《唐严武乞赐山南寺表》等材料^③。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清代刘喜海的《三巴金石苑》、汪鋈的《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以及民国时期刊印的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均录有部分广元、巴中石窟寺造像题记,并有考证。各地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府、州、县志也对本地历史上的石窟和相关题刻作了详略不一的记载。

民国以后,对流域内的石窟造像进行调查研究的推 1914—1917 年法国的 Victor Segalan (维克多·色伽兰,也译作谢阁兰)等人的中国考古调查团,他们调查了广元千佛崖、皇泽寺以及巴中南龕、绵阳西山玉女泉等地石窟,并于 1923—1926 年出版了《中国考古调查图录》,共 3 卷,2 卷图版,1 卷文字,后冯承钧将其节译为中文出版,改名为《中国西部考古记》^④。其中关于绵阳西山玉女泉、广元千佛崖的记录和照片资料弥足珍贵。这两处石窟后来被毁较多,原始面目赖 Victor Segalan 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全。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观点颇有错讹。

抗战期间,大量科研机构 and 科研院校内迁。杨家骆先生主持中国学典馆迁至重庆北碚之北温泉,为大足石刻的发现提供了契机。1945 年春,杨家骆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成立“大足石刻考察团”,进行了编号、测量、摹绘、椎拓等专业考察工作,在此基础上汇编成《大足石刻图征初稿》并全文收入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考察团给予了大足石刻极高评价,认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⑤。此次调查系统而科学,加之事后学者们的大力宣扬,大足石刻逐渐为世人所关注,为日后大足石刻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

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嘉陵江流域的石窟寺尚处于调查和研究的萌芽时期,其中大足石刻调查团的出色工作值得铭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更多的石窟点得以发现。特别是在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记录了大量石窟点。另外,在基建工程中也偶有石窟寺发现,如剑阁下

①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 66《利州东路》,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点校:《輿地纪胜》卷 185,第 9 册,第 5391 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蒋晓春、郑勇德、刘富立等《论四川阆中南齐〈隗先生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5 期)依据实地调查所得对《輿地纪胜》中“神室洞”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认为神室洞即今天的石室观。

③ (明)杨慎著,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上中下),北京:线装书局,2003 年。

④ (法)谢阁兰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

⑤ 刘长久:《大足石窟研究综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第 3 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年。



寺道教石窟^①和潼南千佛寺石窟^②。

与此同时,部分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学术考察,使川渝地区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情况越来越为世人所了解。比较重要的一些调查或考察有如下几项。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文和先生系统考察了川渝地区石窟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出版了《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一书^③。书中分流域介绍了道教和佛教石窟寺,其中的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沱江和涪江之间流域,南江、巴江、通水、宕水、渠江流域等部分材料属本文所称的嘉陵江流域,大量材料属首次披露。胡先生还对川渝地区石窟寺进行了综合研究,对石窟寺分期、题材、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是对川渝地区石窟寺进行整体介绍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难能可贵的是,在介绍和研究时均将道教石窟置于佛教石窟之前,提醒学界需对川渝地区的数量众多、价值巨大的道教石窟给予更多关注。在主编《西南石窟文献》时,胡先生对该书进行了重要修改并收入《西南石窟文献》中^④。后来作者将其中的道教石窟和石刻部分辑出并增加了不少新材料和新研究撰成《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一书,将道教石窟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⑤。2016年胡文和与胡文成出版《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一书^⑥。该书集作者三十余年考察和研究巴蜀佛教石窟寺的大成,煌煌三册六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长久先生也长期致力于西南地区石窟寺的研究,对巴蜀地区的安岳、大足、合川涪滩等地石窟用力甚多。颇为难得的是,刘先生的着眼点并非局限于川渝地区,而是整个西南地区,他对云南、西藏等地的石窟给予了同样重要的关注,这从他的大作书名就可以看出^⑦。

1989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先生率领由宗教、考古、美术三个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对川北地区石窟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考察。成果《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⑧《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⑨两文按时代和造像性质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研究,这是对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石窟进行的第一个综合性研究。

此外,陈明达^⑩、王家祐^⑪、张明善、黄展岳^⑫、史岩^⑬、负安志^⑭、侯正荣^⑮、阎文儒^⑯、顾森^⑰、

① 青兴海:《四川广元剑阁发现北魏道教摩崖遗迹》,《华西都市报》2006年11月10日。

②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潼南县千佛寺摩崖造像清理简报》,《考古》2013年第12期。

③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 胡文和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石窟文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⑥ 胡文和、胡文成:《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

⑦ 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 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文物》1990年第6期。

⑨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室:《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第6期。

⑩ 陈明达:《四川巴中通江两县石窟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⑪ 王家祐:《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⑫ 张明善、黄展岳:《四川广元县皇泽寺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⑬ 史岩:《关于广元千佛崖造像的创始时代问题》,《文物》1961年第2期。

⑭ 负安志:《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文博》1984年第3期。

⑮ 负安志、侯正荣:《四川广元县皇泽寺石刻调查纪要》,《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⑯ 阎文儒:《四川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

⑰ 顾森:《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形成年代初探》,《美术史论丛刊》1983年第2期。

李淞^①等人也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开展了调查或考察工作并有文章发表。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开展的调查很多,如大足、巴中、广元、安岳等地文物部门对境内石窟的广泛调查和记录。

相比于学术界个人和当地文物部门的考察或调查,更高层次的专业调查始于21世纪初。200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先生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毅先生倡议发起“四川石窟寺工程”。其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调查了广元、巴中境内重要石窟,出版了《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②、《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③、《广元石窟》^④、《巴中石窟》^⑤、《巴中石窟内容总录》^⑥和《巴中石窟调查简报》^⑦等系列报告,成都文物考古所同时还对苍溪、剑阁、安岳等地石窟进行过调查,发表了一批调查简报^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则对绵阳、夹江境内重要石窟进行了调查,出版了《绵阳龕窟》^⑨、《夹江千佛岩》^⑩等书。四川大学考古系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调查了安岳的玄妙观、仁寿县境内的一些石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安岳卧佛院石窟进行了调查和保护。四川美术学院近年来致力于“大足学”的构建,成立了“大足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与成都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合作调查了安岳卧佛院,出版了调查报告^⑪。西南民族大学石窟寺研究所对安岳的茗山寺进行了详细调查^⑫。本课题组近年着重调查了阆中、营山、广安、合川等地石窟,发表了营山县太蓬山^⑬、阆中石室观^⑭、雷神洞^⑮、佛子岩^⑯、合川龙多山^⑰等地石窟寺调查简报及一些研

① 李淞:《四川隋唐道教石刻造像——中国道教雕塑述略之五》,《雕塑》2009年第6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④ 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

⑤ 巴中市文管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中石窟》,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⑥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巴中石窟内容总录》,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⑦ 巴中文管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巴中石窟调查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⑧ 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剑阁横梁子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广元普济镇佛爷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广元旺苍县木门寺摩崖石刻调查简报》《广元苍溪阳岳寺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均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安岳县文物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灵游院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文物局:《绵阳龕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乐山市文物局等:《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⑪ 大足石刻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等:《安岳卧佛院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⑫ 西南民族大学石窟寺艺术研究所:《四川安岳县茗山寺石窟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

⑬ 蒋晓春、伍洪建、邵磊:《营山县太蓬山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

⑭ 蒋晓春、郑勇德、刘富立等:《四川阆中石室观隋唐摩崖造像》,《文物》2013年第7期。

⑮ 蒋晓春、符永利、杨洋等:《四川阆中雷神洞石窟寺内容总录》,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⑯ 蒋晓春、杨洋、陈龙等:《四川阆中佛子岩石窟内容总录》,王胜明、金生杨主编:《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⑰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合川区文物管理所:《重庆龙多山石窟调查简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究文章。上述调查工作专业性较强,部分使用了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记录翔实、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基础资料欠缺的局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调查工作看,一些重要石窟点已经得到关注,成果引人瞩目。巴中、广元、安岳、大足境内的重要石窟寺已经得到专业调查并出版了一些调查报告。不过,客观而言,面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大量石窟点,包括一些重要石窟点没有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另一方面,部分已经调查过的石窟点还没有出版报告(如大足和安岳地区的许多重要石窟点),给深入研究带来一些困难。

四、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研究

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除调查报告、简报及介绍性成果外,依成果内容大致分类如下。

(一) 分期研究

分期研究中有较大区域石窟的分期,也有较小区域的分期,甚至是某个石窟点的分期。

1. 较大区域的分期

胡文和先生长期从事川渝地区石窟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自称考察过川渝地区 3200 多个石窟,实属不易。在其大作中将道教石窟分为隋代、唐代、宋代三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石窟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将川渝地区佛教石窟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南北朝至隋代、初盛唐、中晚唐、五代、宋代^①。该分期虽未专门针对嘉陵江流域,但也涵盖了流域的大部分,基本上可视为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

刘长久先生在叙述四川(含重庆)石窟寺艺术发展历史时分南北朝、隋代、初盛唐、中晚唐、五代、宋代、元明清至民国几个阶段进行,并对各时期石窟寺发展情况作了高度概括:南北朝为缘起、隋代为较兴盛、初盛唐为蓬勃发展、中晚唐为繁荣、五代为盛昌、宋代为登峰造极、元明清至民国为余绪,清楚地勾勒出了整个四川石窟寺的发展阶段性^②。

此外,童旭蕾将四川隋唐时期道教石窟造像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对象,并将其分成隋至初唐、盛唐、中唐至唐亡三个阶段^③。

2. 较小区域的分期

较小区域的分期研究主要针对大足、巴中、广元等石窟寺相对集中的地区。

对巴中石窟进行分期的有程崇勋和雷玉华等人。程崇勋分为隋到初唐、盛唐、中晚唐、南宋、明代、清代六个时期^④。在后来的著作中,程先生又将隋代到初唐加以区别,从而形成七个时期^⑤。雷玉华对巴中石窟关注很多,她将巴中石窟分成七期九段,分别为第一期:隋至初唐;第二期第一

①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童旭蕾:《四川地区隋唐道教石窟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 程崇勋:《巴中石窟分期初探》,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⑤ 程崇勋:《巴中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段：贞观至高宗时期，第二期第二段：武周至开元初；第三期：开元后期至天宝时期；第四期：8世纪下半叶；第五期第一段：9世纪上半叶，第五期第二段：9世纪后半叶；第六期：南宋；第七期：清、民国^①。较之程先生的分期，在唐代阶段分得更细。

对广元石窟分期的成果首推姚崇新^②。他首先将广元石窟分为唐代和唐代以前两个大阶段，分别对两个阶段的石窟寺进行了分期。他将唐代以前石窟分为两期。第一期：北魏晚期至北周时期；第二期：隋代。唐代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武德贞观之际，绝对年代在620—700年；第二期：8世纪上半叶，即700—750年；第三期：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上半叶，即750—850年。第三期之后尚有少量石窟，姚先生未再进行分期。

大足石刻蜚声中外，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宋朗秋对大足境内71处948龕根据龕窟形制、题材、风格、技法等特点将大足石刻分为唐（前、后期）、前后蜀、两宋（北宋、南宋）和明清民国四个时期^③。

此外也有学者对安岳石窟进行了初步分期研究。曾德仁将其分为盛唐、中晚唐、前蜀、后蜀、北宋、南宋六个时期，并提及明清时期亦有造像活动，但已不构成声势^④。

3. 单个石窟的分期

嘉陵江流域石窟除巴中、广元、大足、安岳等少数地方外，多以零星、小规模形态存在，故对单个石窟点进行的分期研究不多。黎方银、王熙祥对大足北山佛湾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将保存较好的154个龕窟分成了晚唐（892—907年）、前后蜀、北宋末到南宋初三个时期^⑤。

（二）题材、内容研究

题材和内容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胡文和先生特别重视道教石窟，在《四川道教佛教石窟寺艺术》中对四川地区道教造像神格分道教尊神、道教俗神及经变进行了细致研究，对佛教石窟的佛（三佛、弥勒佛）、菩萨（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羼索观音、地藏）、天龙八部及经变故事（说法、释迦多宝并坐说法、西方净土变、涅槃变、药师变、维摩诘经变、千手观音变、十三面观音变、地狱变等）等题材也进行了专题考证^⑥。

对一个较小区域石窟寺题材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广元、巴中和大足几个石窟寺富集地区。

雷玉华对巴中石窟中的西方净土变、菩提瑞像、毗沙门天王、地藏、如意轮观音、双头瑞像、天龙八部等题材进行了专题研究^⑦。程崇勋先生亦对巴中石窟中的常见题材进行了探讨，如佛（释

① 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② 姚崇新：《巴蜀地区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亦见姚崇新：《广元唐代佛教窟龕与造像的分期与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和《广元唐以前佛教窟龕与造像的分期与年代》（《艺术史研究》第6辑，2004年）两文。

③ 宋朗秋：《大足石刻分期述论》，《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⑤ 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胡文和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石窟文献》第4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4—464页。

⑥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⑦ 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七佛、三世佛、五方佛、十方佛、毗卢佛、多宝佛、瑞像、鬼子母)、菩萨(胁侍菩萨、正觉菩萨等)、弟子(二弟子、十弟子、善财龙女)、护法神众(天龙八部、天王、力士、哼哈二将)、飞天伎乐、供养人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同时对巴中道教石窟中的尊神(三清、四御、三官大帝、星辰之神)、神仙(八仙)、护法神将(关圣帝君、萨真人、龟蛇二将、雷神等)、俗神(月亮菩萨、灶神、土地、药王、火神、龙王、鲁班、五显神、城隍、财神、哪吒、孙悟空等)也进行了研究^①。

姚崇新对广元石窟中的释迦多宝组合、文殊菩萨、地藏造像及其组合、密教造像等题材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看法^②。

学术界对大足石刻题材的研究成果颇多,论文就多达数百篇,论及题材者也甚多,限于篇幅,兹择要介绍。就大方面而言,有探讨大足石刻的宗教性质者,如宝顶山、北山石窟是否为密宗道场就有多篇论文,有持肯定意见者,如郭相颖提出大足石刻中之宝顶山石刻为“完备而有特色的密教道场”^③,阎文儒^④、温玉成^⑤、陈明光^⑥亦认为宝顶山和北山石窟属密宗道场;亦有持反对意见者,如李哲良《我观大足石刻》^⑦。此外有研究大足的道教^⑧和儒教石窟^⑨以及三教合一属性者^⑩。

嘉陵江流域天龙八部形象较常见,陈悦新对川北地区天龙八部形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形象和排列次序^⑪。刘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四川地区唐代天龙八部形象的演变以及社会背景等问题,其中大量材料涉及嘉陵江流域的广元和巴中地区^⑫。

双头瑞像是川北地区颇具特色的造像形式,雷玉华^⑬、宁强^⑭和罗玲^⑮都对其进行了研究。

① 程崇勋:《巴中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② 姚崇新:《巴蜀地区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③ 郭相颖:《宝顶山摩崖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佛教密宗道场》,《四川文物》1986年第S1期。郭相颖:《再谈宝顶山摩崖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④ 阎文儒:《大足宝顶石窟》《大足龙岗山石窟》,均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S1期。

⑤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⑥ 陈明光:《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年代布局及内容——宝顶山石窟密教道场造像研究之一》,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⑦ 李哲良:《我观大足石刻》,《重庆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⑧ 论及大足道教石窟的论著较多,如邓之金《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王家祐《大足石刻道教造像渊源初探》、李远国《四川大足道教石刻概述》和胡文和《大足南山三清古洞和石门三山皇洞再识》等,以上论著均见胡文和主编:《西南石窟文献》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⑨ 例如胡昭曦《大足宝顶石刻与“孝”的教化》、李正心《大足石刻中的儒教造像及其产生根源》和何代福《试论儒学对大足石刻的渗透和影响》等,均收录于胡文和主编:《西南石窟文献》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⑩ 李福睿:《谈谈大足石刻“三教合一”的宗教意识倾向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⑪ 陈悦新:《川北石窟中的天龙八部群像》,《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

⑫ 刘成:《四川唐代天龙八部造像图象研究》,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⑬ 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⑭ 宁强:《巴中摩崖造像中的佛教史迹故事初探》,《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⑮ 罗玲:《唐代四川佛教造像中的“菩萨装佛像”研究》,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